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宋广波
编

丁文江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宋广波
编

丁文江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丁文江卷/宋广波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20352-2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丁文江 (1887~1936)-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47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丁文江卷

宋广波 编

Ding Wenjia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2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2 000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基于丁文江在中国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卓越贡献，学界对他有不少敬称，如“中国的赫胥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术界的政治家”等。若要全面评述丁先生的生平、思想、学术、事功，非一篇导言所能承担。这里，主要围绕“丁文江与科学”、“丁文江与政治”两个方面（即其一生事功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略作评述。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发达的一门科学。地质学史的第一页，即中国科学史的第一页。作为公认的开创中国地质学的最重要的先驱^①，丁文江充分利用其办事才具^②，成功营造了地质学在中国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地质学的成功，不仅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也为其他科学的发展、进步发挥了表率作用。作为“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把提倡、推动科学研究视为己任，在这一点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由他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当时即被认定为开辟新纪元的

① 与丁文江一同创业的章鸿钊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章鸿钊：《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地质论评》，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翁文灏则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友人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学生辈的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载《地质论评》，第12卷，第1、2合期，1947年2月）。

② 按，这里所谓办事才具，可用葛利普的话做个注解：过人之能力，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参见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

“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①；而从整个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角度讲，它是最有力亦最有影响的科学精神宣传运动。1934年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不仅把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机关建立在长久、合理的发展基础上，而且以科学的态度、高远的眼光，布局、规划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其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彪炳史册。要之，在丁文江身上，恰到好处地汇集了“科学研究的先行者”、“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科学事业的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先从地质学说起。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先从培养人才做起。1911年，中国习地质者，仅章鸿钊、丁文江二人。章氏早在1911年就擘画了地质调查事业的周详计划，但因缺乏专门人才，所有计划均无从着手。1913年1月，丁文江一到北洋政府任职，即把培养地质调查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一手创办了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目的的地质研究所。该所开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之先河，它培养的18名毕业生，均成长为中国地质界的台柱；它的办学经验，则很好地传承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地质教育部门。

其次，丁文江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首任所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之成为中国地质学得以持久、合理发展的重心，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科学研究重在实践，地质科学尤然。作为中国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丁文江格外重视野外调查和动手能力，他不仅以身作则，万里长征^②，并严格地将其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传之于他的团队^③。经数年努力，丁文江终于可用事实驳斥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擅长野外工作的偏见。^④毋庸讳言，限于当时的人力、财力，丁文江领导的区域地质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北方五省，调查的资源也仅限于

① 参见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见《科学与人生观》。

② 1919年丁文江自谓：“……然此七年中，文江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丁文江：《〈地质汇报〉序》，地质调查所印行，1919年。）

③ 翁文灏回忆说：“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

④ 参见丁文江：《〈地质汇报〉序》。

煤、铁。但是，在地质调查所，研究的氛围是浓厚的，研究的标准是可靠而又严格的。^①同时，为谋长久发展，丁文江等也大量搜集图书并建立地质图书馆，购置仪器完善实验室，充实地质博物馆，印行专门刊物《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充分利用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之机，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等。这些工作均系地质学发展、进步之必要条件。这里，以地质图书馆为例来略作说明。早在建所之初，丁文江就有规划：所中附设图书馆，搜集地质图籍，以为研究之资料。^②盖因科学研究非有相当之参考书籍不可，而这又绝非个人所能置备，必须有公共机关专门为之方可。地质调查所的藏书，主要得之于三途：征调、购置、交换。1913年2月3日，丁文江曾代工商总长草拟公函，向各省民政长征调地学图书（以方志为主）。次年，因野外调查增多，丁又代农商总长草拟致税务督办、交通部、参谋本部、京师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图书馆、中国驻俄公使等公函，征集地图。由此，方志、地图收藏成为地质图书馆的一大特色。而购置地学书刊，更可显现初创者之苦心孤诣。当时从国外购书的办法是：凡美国出版之书，由留美人员叶良辅购置；欧洲出版之书，委托瑞典中央博物馆的哈勒博士经理，并请周赞衡、朱家骅襄助；但因这类书籍和旧出期刊、杂志系出版多年，原机关已无存本，须向旧书店搜购，或须嘱托专家辗转访觅，方能获得。^③1919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期间，曾广泛搜求、购置各种地学图书；回国后，即开始筹划兴建地质图书馆。经过募捐^④、设计等烦琐工作，该图书馆于1921年落成。中国的几代地质人都承认：中国地质

① 丁文江对学术著述要求极为严格，绝不轻易发表地质报告。他认为：“所贵于官书者，以其精且备也”，他最恨“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丁文江：《〈地质汇报〉序》）。

② 参见丁文江：《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载《政府公报》，第339号，1913年4月17日。

③ 朱家骅回忆说：“民国九年，他（按，指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汇集有关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德文杂志图书，要我替他在德国选购，这样才和他开始通信。”（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见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15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又可参考地质调查所编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地质图书馆》（地质调查所15周年纪念刊），27页，1931年。

④ 丁文江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募集近4万元之巨款，也与他数年来的广种善因分不开。当时捐款的，主要是矿业界企业。其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经营过程中，经常得到地质调查所的无偿帮助：不论是测量矿区，或是绘制地质图、化验矿质、决定打钻地点，只要是真正办矿的人，地质调查所都愿意帮助其工作、帮助其计划，个人与机关都不收任何的酬报。（参见丁文江：《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载《申报》，1935年12月6日。）

学辉煌成就的取得，与这座藏品丰富、管理完善的专业图书馆是分不开的。杨杏佛曾指出，提倡科学，“当以研究为终始，然研究非尽人可能也。必有专家，有书报，有仪器，有金钱与时间，然后可行”^①。事实上，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之种种步骤，与此说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只有这样，地质调查所才成为坚实的地质科学研究中心。

1922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丁在成立会上演讲称：

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生活科学中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②

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该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而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地质学已走上体制化发展的道路。

地质学的成功，直接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图学。这几门科学的进步，均与丁文江有密切关系。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最近，因为地质学家要判定地层，对古生物化石的认定至关重要。1910年代，中国无古生物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区采集的化石不得不送到美国去鉴定。地质研究所缺乏古生物学教授，丁文江就勉为其难地亲自授课。有鉴于此，丁文江派门人周赞衡到瑞典学习古植物学，并设法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在英国获地质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兼职），后来的中国古生物学人才多出自葛、李二人门下。他又在地质调查所创办《中国古生物志》，使之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所有这些，使古生物学在数年之内就发展成一门成熟学科。

① 杨杏佛：《科学与研究》，见《科学通论》，217页，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

② 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会之目的》，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1~4期，1922年，8页。

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上，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科学发现，那就是 1929 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而丁文江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他曾多次带学生来这里实习。丁文江对地图学也极其关注，前文已述，他从 1910 年代就开始广泛征集各类地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地图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申报》地图。关于丁文江倡导并主持此地图的编纂，可参考拙编《丁文江年谱》的有关记述，这里不再赘言了。

以上科学活动均与丁文江、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地质调查所还从事地震、燃料、土壤研究。所以，可以这样说：地质学是中国科学中的“母科学”。

再说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的贡献。

1910 年代，在中国，科学传播的阵地有二：一为 1915 年在美国创刊的《科学》，一为同年在上海创刊之《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前者的创办主体是 1914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后者的主体则是以陈独秀、胡适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艺群星们。《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新知，该杂志聚拢了一批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新留学生，包括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金帮正、邹秉文、郑宗海、黄昌谷等。他们在《科学》上广泛、深入地阐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极好地承担起宣传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的任务。只是，这个留学生刊物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科学》并时的《新青年》高举“赛先生”大旗，对树立科学的权威地位功不可没。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来没有像《科学》那样认真地讨论过“科学”是什么，所以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们在充分研究了“赛先生”之后，常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派笔下的科学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① 有的研究者则指出：“赛先生”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批判传统思想，并以此来建构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② 但是，异常吊诡的是，当时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却主要是来自《新青年》，而不是《科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新青年》为主

^① 参见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余英时等：《五四新论》，69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② 参见任定成：《科学方法论的三个方向》，见《北大“赛先生”讲坛》，207 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第二，国人尚未见到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对其意义和价值尚未能切身感受到，因而尽管有科学社诸君子大力宣传，难免显得空洞，难以产生共鸣。

丁文江并没有参与《科学》、《新青年》的科学宣传工作，其时，他正全力地从事着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工作。丁文江是先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并在从事的学科领域打开局面后，再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科学家群体，是先做宣传的工作，后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丁氏从事科学宣传工作，最有影响者，是他挑起并以主角的身份参与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是科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已为众所公认，对其研究亦层出不穷。对其具体论点，这里不拟申论，只想强调：这是最大规模的一场科学思想传播运动。它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越了之前的《科学》、《新青年》所做的工作。自此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透，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原因是：

一，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阵营，既包括当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如任鸿隽、新文化运动派的胡适，还有当时中国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丁文江、章鸿钊、王星拱、唐钺等人，这些本来在宣传科学时互不连属的人来了一个大集结。

二，丁文江参与论战时，以他为代表开创的中国地质学的成绩，已经得到国人的认可，人们已经看到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实惠——这可以从地质图书馆得到巨额捐款得以证实。由此，科学的威信开始在国人心中逐步加强。

三，这次科学宣传活动，是通过“论战”的方式进行的，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孰优孰劣，观众自然容易做出判断。

科学派的大获全胜，不仅最大限度地宣传了科学思想，而且摧毁廓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怀疑科学的思潮。因为，在一战后反思科学的大潮流下，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等人的思想是会重创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这时，丁文江振臂一呼，起而论战，带领一班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哲学家向张君勱发起全面反击，进一步阐释西方科学的基本含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实在是中国科学运动的大胜利，值得研究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的人大书特书的。所以，丁文江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其功绩绝不亚于开创中国地质事业。

二

与其他一流科学家不同的是，丁文江在从事科学活动的同时，对政治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不仅有独特的政治思想，还有政治实践。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时，恰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益腐败、倒退的时候。当时的黑暗政治甚至逼迫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知识人也出来批评政治。^① 身为北洋政府“小吏”又一向关心政治的丁文江，对这种“恶政”有切身感受：“……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② 他调查云南矿业后的结论是：我国矿业不振的最大之障碍，系由于“行政之不良”^③。因此，丁文江对北洋政权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认为它和满清政府一样坏：“土匪遍地，政府号令不出国门，军阀割据，贿赂公行，内外债没有着落，上下人无法生存”^④。事实使他认定：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⑤。这里所谓“改良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在丁看来，政治改革比其他任何社会改革都重要，是第一要做的。他批驳“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观点，认为这是趁火打劫的人“拿改良社会这种题目来抵制政治改革”^⑥，是政治改革的一大障碍。他质问持这种观点的官僚、政客：“这几年来政治的不良，还是社会的过失，还是他们的过失？老实说来中国弄到了这样地

①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称“我们本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晨报》，1920年8月1日）。

② 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努力》周报42期，1923年3月4日。

③ 丁文江：《上农商总长书》，据黄汲清等编：《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Geological Reports of Dr. V. K. Ting*），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发行，1947年，235页。

④ 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努力》周报42期，1923年3月4日。

⑤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载《努力》周报67期，1923年8月26日。

⑥ 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6、7期，1922年6月11日、18日。

步，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是没有能力。”他也反对“到民间去”的观点，认为这是“缓不济急”^①，没有找到真正下手的地方。丁文江曾多次当面批评胡适“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他说：“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② 丁文江反对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的观点，他曾对董显光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③ 又对李济说：“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④

既然政治改革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改呢？丁之中心理论是“少数人的责任”。所谓“少数人”，是这样的人：有遗传的天才，又遇有良好的境遇，从而能在社会上占一种地位，成一种势力。“少数人”也可以理解成他和胡适、蔡元培等提倡的“好人政府”的“好人”，所谓“好人”，就是指有现代知识、有职业、有能力、有操守的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特别是能出来和恶势力抗争的优秀分子。丁认为，这种人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他认为中国政治混浊，就是因为“少数的优秀份子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掌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我们打定主义，说中国是亡不得的，中国就不会亡”^⑤。显然，他所谓“少数人的责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

那么，“少数人”如何从事具体政治呢？丁文江提出要从以下四端入手：

甲：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

乙：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用科学精神，来研究解决这种

① 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 6、7 期，1922 年 6 月 11 日、18 日。

② 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胡适纪念馆印行，1973 年，36 页。

③ 董显光：《我和在君》，见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172 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④ 李济：《怀丁在君》，载《独立评论》，第 188 号，1936 年 2 月。

⑤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载《努力》周报 67 期，1923 年 8 月 26 日。